



祖国剧团与沙龙咖啡店

陈嘉平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前排左起：陈嘉平（陈平）、余谷似、吴绍华
 后排左起：方康泰（方健平）、郑天健、刘浩（灏）

祖国剧团初建时的几位老战友

于是之 王 皇 苏 民 郑天健 陈嘉平 王凤耀 居乃琨（从左至右）





作者与其妻子彭彩茹合影

左：陈嘉平（陈平）右：郑天健



序

大约十年前，陈嘉平同志在中国文联上班时，就有写祖国剧团的计划，我知道后，表示支持。祖国剧团成立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北平，是当时我党的地下组织建立的。大家知道，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将往何处去？前进还是倒退？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的命运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艰苦异常的斗争。在这个时候，北平地下党建立一个话剧团体，显然不只是为了演出进步话剧。

祖国剧团由陈嘉平同志出面创建并担任团长。嘉平同志是蒙古族，早在1936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于进步的话剧运动，先后参加过中国旅行剧团、上海艺术剧社、苦干剧团等职业话剧团，编、导、演各项工作都从事过。他所负责的祖国剧团，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在平、津两地的文化斗争中，贡献不小，影响颇大。

现在，嘉平同志把他们当年的活动写成了《祖国剧团与沙龙咖啡店》一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写了不少当年平津两地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进步文化界在艰难岁月中的战斗历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温一下这些战斗历程，无疑是有益的。

阳翰笙



1993年3月于北京医院。

前 言

每当幸存下来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老上级皓首相聚、促膝谈心时，总要提及：大家应该利用各自极为有限的晚年时光，尽可能多地写出点什么。让读者，特别是让那些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勤于学习、勇于进取、充满活力的年轻读者们，多了解了解：生活在苦难深重不幸年代的人们，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与惨淡人生，拖着一双双沉重的脚步，不畏风霜、雨雪、酷暑、严寒，踏在蒺藜遍野、荆棘丛生的祖国大地上，是怎样摸索，怎样追寻，又是怎样不顾鲜血流淌，一步步走过来的？

我这里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以我个人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写的是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到1946年人民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在北平这座文化古都与天津码头，我党围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决定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课题，同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争中，一条色彩缤纷的文化艺术战线上，展现出来的一幕幕动人心弦、引人深思的战斗故事。

我的故事从日本宣布投降的天津码头谈起，进而涉及抗战

前，北平“一二·九”运动时期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市民百姓被侮辱、被损害、被奴役的痛苦呻吟，直到“敌战区”的北京，又变成“国统区”的北平，这一特定时期、特定环境，我们党的秘密组织面对严峻形势，被迫继续隐蔽工作；为什么要在北平建立一个党直接领导下的祖国剧团？它的方针任务是什么？党在剧团诞生时，是怎样向同仁们提出来的？在国民党政府反动措施与猖獗不休的反共叫嚣声中，它曾经受了哪些挫折、困阻与考验？它根据党的指示与要求，对于一些刚刚从敌人铁蹄下解脱出来，满脑子正统观念，正处于迷离彷徨无以适从思想困境的知识分子，是怎样摆脱思想束缚，怎样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明辨是非，认准方向，走向党指引的光辉大道的？当蒋介石亲临北平，亲自布署，随时准备再来一次“四·一二”式的反革命大屠杀时，祖国剧团的众多战友们，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又是怎样勇于搏击，不畏艰险，为完成党交付的历史使命坚持战斗的……

祖国剧团是在“冀南”区党委领导下，以“北方局”干部刘浩同志为首的“敌占区”点线“工作组”三人领导核心，负责文教宣传工作的余琦同志，针对日本宣布投降后带来的形势变化及其特点，提出的加强北平地区进步文化活动与知识分子工作方案中，一项比较突出的具体任务。余琦的整个方案，曾得到晋察冀“城工部”刘仁同志高度赞扬与支持。余琦同志亲自承担起这一文化工作方案付诸实现的全部领导责任。他为了创办这个剧团，特意为“工作组”组长刘浩同志与我，安排了一次“党内地下会见”，动员我以老戏剧家身份出面负责完成这项任务。

正当祖国剧团与它的姊妹单位沙龙咖啡店抓紧时机相互配合开展工作时，国民党中央从重庆派来一位统管平津地区文化

工作领导大权的文化专员和一位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掌握实权的总干事，双双“自渝飞平”（见当年报纸新闻）。他们一下飞机，对北平文化古都的文化艺术界，即采取了一系列不寻常的措施。

余琦知道了，即刻要求我们主动“迎上去”，摸清情况，与之交往，进而，展开种种公开的、隐蔽的以及无法回避的交锋。使我们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从中尝到不少苦、辣、酸、甜；同时，也接受了一次又一次难得的考验与锻炼！

没有余琦同志的倡议与支持，就没有祖国剧团的诞生；没有余琦同志身上那种只有八路军指挥人员才具备的素质与指挥才能，也就没有我们祖国剧团的工作进展与节节胜利。

祖国剧团初建时期的团址，曾设在西单绒线胡同西口沙龙咖啡店内。这是余琦同志文化工作方案中，由他亲自掌握的另一个外围活动点。每当夜幕降临，商店上门以后，我和店内大部分职工，即按照余琦同志的安排，爬上厨房后边的窄梯，钻进一座还算宽敞的小阁楼，组织大家时事政治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和《晋察冀日报》等材料，我就是在这座小阁楼里读到的。

我们剧团在创建时期，有过两次正式公演：一是曹禺的《蜕变》，二是李健吾的《以身作则》。当我们为第二次公演忙于排练时，沙龙咖啡店出事了，一群警察、侦缉队利用夜深人静时，闯入店内，借口查户口进行了一次搜查。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查到。反而遭到我们的掩护人余谷似同志以财东老板身份，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深入敌市党部，对几个特务头头怒斥一番。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不久社会上即冒出来一股政治性的谣传。说什么：“中共在北平有三大红色据点：一是军调

部、二是滕公馆、三是沙龙咖啡店。”这是怎么回事？（这在我的回忆录中，将根据“工作组”组长的介绍做出较为详尽的回顾。）这里，我需要谈的是“祖国”当时不得不设法摆脱可能受到的牵连，以便保证二次公演的实现与继续活动的条件。

其后，余琦又发现了解他政治身份的两位地下党员，没有听从组织劝告，未及时转移而被捕入狱。说明国民党反动当局搜捕、镇压中共地下党员的行动加剧了。余琦立即找到刘仁同志研究对策。因此决定“工作组”所属北平各摊工作全部移交“城工部”负责。沙龙咖啡店已引起敌特注意，决定撤消，余琦同志提前回根据地。临别，余琦同志嘱咐我：“必要时，赶快去找我！”

我率领祖国剧团部分职业演员去天津，与国民党官方人物办的剧团合作演出郭沫若的《孔雀胆》。我们为了响应上海影剧界艺人“反抗艺员登记”运动，联合天津市戏剧界朋友，进行声援。为此，我与天津市国民党党部官方，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远在“冀南”军区的余琦同志，恰在此时派出地下党员方康泰同志，迅速赶来津门，通知我撤退。我在老方陪同下，越过封锁线，到达“冀南”衡水五分区。“工作组”刘浩同志正在那里，高兴地告诉我：“余琦在威县等你。”

“冀南”区党委机关设在威县。领导上打算安排余琦出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职务。我来到威县，住在“冀南”区党委招待所，饭后经常找余琦坐在区党委大院聊天。他说：“我不愿意留在上层领导机关，希望下放。”

余琦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刻回到根据地的。一路上，他看到河北平原广袤土地上的田野、村庄，一簇簇农民正忙于耕作。这都是当年我军遵从党和毛主席的号召，

深入敌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用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与生命，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一寸一寸土地解放出来的。如今，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军支持下，妄图一举攻克解放区，摧毁抗日民主政权，消灭共产党，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反革命行径！余琦想到：“自己曾为这块解放了的土地出过汗、流过血。不少战友、同志先我而去。现在，我回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部队大军压境的形势，自己应当干点什么？”

他想回部队，但是，一摸到自己残缺不全的肢体和一瘸一拐行动艰难的身躯，不由得长长嘘出一口气，知道不行了，知道自己已失去重返沙场，拼搏冲杀的条件与可能。他反复学习了毛主席有关著作及党内文件，理解到在内战风云再起的形势下，为确保解放区的安全，巩固革命根据地后方，必须认真搞好土地改革，帮助那些依然忍受着千百年来封建剥削压迫的劳苦农民翻身解放。这是当务之急。这对于解放区大闹生产、拥军支前、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政治任务。他联想到抗战初期，参加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时的情景，作为八路军指战人员，他早已同当地工农群众建立起亲如骨肉的密切关系。如今，自己为什么不再次回到农村，深入下去，与他们一起生活，共同战斗呢？想到这里，他下定决心，力争下放。

我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任教时听说余琦同志的要求如愿以偿，已下放到高唐，投入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翻身运动。

历史上有名的刘邓大军过黄河的辉煌战斗，鼓舞着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全体师生，激情满怀地争先恐后奔赴黄河岸边馆陶一带后方总院，做护理伤病员的工作。大家通过从黄河彼岸前

线上撤下来的许许多多伤病员同志的战斗事迹与勇敢的革命精神，受到了深刻的鼓舞和教育。我们这一批来自“解放区”、“国统区”各大小城镇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这样一场战斗性的实际锻炼，几乎是人人思想感情、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主要是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明显的改变，都渴望今后在理论学习中，能有机会接受更多的艰巨任务，更多的实际锻炼和考验。

返校不久，我听说余琦到高唐后，经常深入区、乡，与贫雇农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迅速取得土改工作很大的进展。可惜，他那残躯弱体已力不从心了。高唐临近“国统区”，属根据地边沿地带，情况异常复杂，斗争相当激烈。余琦工作繁重，日夜辛劳，曾多次昏倒在工作岗位上。同志们看他实在不行了，经认真研究，请示上级，决定派人护送他到衡水，那里交通发达，医疗条件较好，余琦的老关系多，便于求医治疗。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深感不安，随即请假，赶去衡水看望他。

余琦住在衡水滏运公司小楼上一个里外间。环境相当洁净、安适。一位纯朴可爱的红小鬼住在外间，专门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余琦见我来看他，显得分外高兴，他像往常一样，拉住我滔滔不绝地问这问那。当我问到他的病情时，他迟疑片刻，不愿多谈，告诉我：“不要紧，必要时，还可以钻回北京城，在母亲身边，找到名医良药，设法治疗。”

晚饭时，他特意叫小鬼为我弄来满桌子饭菜。其中，免不了滏阳河的大鲤鱼、衡水老白干和热腾腾的白面馒头。他说：“这是我专门为你改善生活的。你成天吃小米饭，到我这儿了，总得丰盛一点，帮助你补充补充营养。”

我看他一味劝我进餐，自己却很少进食。这显然是一种病态。我当面不便多问；事后，向那位红小鬼和公司的人打听，据说他经常是这样，还不能老劝，劝烦了，惹起他的火，能把你臭骂一顿。“你这次来了，他高高兴兴能跟你一块吃，一块儿挟点鱼肉，啃口馒头，喝口菜汤的，已经很不错了。往后，你最好多来看他几趟。”说话的是溢运公司的经理，原来也是地下党的“工作组”三人领导核心之一，主要负责经济方面领导工作的田克东同志。

我在他这儿住了整整三天三夜，谈了也足有三天三夜。不是我执意返校，他还要多留我住几天。余琦谈了不少对母亲的思念，还第一次向我透露他深深爱恋着的一个心上人——一位端庄秀丽精明能干的女孩子。这个人就是1942年，我随上海苦干剧团到敌人占领下的北京城演出时，找到的那位去辅仁大学继续读书的“民先”老战友小贝。她还不是党员，但一直参加党领导下的外围活动，政治思想倾向鲜明，常找余琦一块儿谈心。就是她及时帮助我找到负伤的余琦。据说日本宣布投降前不久，她参与的辅仁大学“读书会”遭到敌人破坏。她也成为敌特机关搜捕对象。慌乱中，她曾跑到余家寻找余琦，没有找到，她也没有向余琦母亲讲明，又慌慌张张出门，跟一位并不熟悉的朋友，一块儿逃往重庆去了。结局如何，不得而知，成为余琦终生理藏心底的一件憾事……

通过这次较长时间的深谈，他也关心我的坎坷经历，和多年未能解决的组织问题，使我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危重病号。他浑身上下，整个精神状态像是一团火！——为了革命，为了工作，为了他人，炽热燃烧着的一团火！

返校时，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师生正准备参加“冀南”区党委组织的土改复查工作。我们去威县区党委，经过一段政策学

习，被编入王任重同志率领的一个工作队，赴山东临清，深入农村，开始了我们又一次的学习和锻炼。

我们这个村的小组工作，进展顺利。总结上报后，王任重同志署名批注，发表在工作通讯小报上。大家都很高兴。正当此时，石家庄解放的消息传来了，立即成为我们战斗生活中，喜上加喜的一件特大喜讯！

石家庄的解放，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华北各解放区基本上连结成一大片。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配合形势的发展合并建立了以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成仿吾等为副校长的华北大学。北大艺术学院归并到华北大学第三部。校址设在正定。我们远在山东农村的师生们接到校方命令，即刻集中河北正定，迎接新形势新任务。

偏偏在这样时刻，衡水五分区组织部王浩同志来信告诉我：余琦同志病情突然恶化，连日昏迷不醒，几经抢救无效，不幸溘然长逝，年仅二十九岁。我被这个消息惊呆了！

信中说：“余琦同志病危时，曾以顽强毅力，为你的历史情况写成一份详尽材料，并向党组织建议，及时帮助你解决组织问题。这是余琦同志一贯对同志关心，对党负责的表现。现已将材料转至有关组织部门，请放心。”（大意）

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怀着沉重心情伴同我们北方大学这支文化艺术队伍，日夜兼程，行军北上。同志们一路都在有说有笑，我却默默地不时地偷偷暗中拭泪！

王浩同志信中还说：余琦逝世消息传开，许多熟悉他，了解他，关心他的同志们、战友们和亲如一家的当地乡亲，在下葬那一天，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竟达五百多人。这在根据地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大意）

远在延安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黄树则同志，听到余琦英年早逝的噩耗，悲痛万分，心情长久长久平静不下来！最后，他与妻子商量，为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取名“念琦”。

组织上追认余琦为革命烈士。

这里，我以沉重的心情，请读者们，允许我通过这本回忆录，向长眠于衡水革命陵园九泉之下的余琦烈士——祖国剧团与沙龙咖啡店的党领导人，表示深切地怀念，诚挚地祝愿余琦烈士的英灵永在！

这本回忆录仅仅是我国革命历史宏伟壮丽诗篇中一个小小的章节。然而，它反映的是我国革命历史进程至关重要的一段关键时期的战斗经历。希望广大读者们从中能够听到一些历史的脚步声。

目 录

序·····	阳翰笙(1)
前言·····	(1)
天津见闻·····	(1)
党内地下会见·····	(8)
“祖国”的思考·····	(41)
彻夜深谈·····	(52)
祖国剧团的诞生·····	(60)
经费的筹措·····	(65)
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争夺战·····	(81)
风雪之夜的演出·····	(103)
“北平剧联”成立大会上·····	(132)
津门的一场战斗·····	(142)
祖国剧团与沙龙咖啡店·····	(159)
后 记·····	(178)

天津见闻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妄图与德、意法西斯结成“轴心”，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吞灭中国，独霸亚洲；终因穷兵黩武，力不从心，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军中遭到惨败，最后，被迫宣布投降。

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4日在东京通过电波宣布投降时，我正在天津同上海归来的话剧演员丁力、卫禹平、孙道临、黄宗英、端木兰心（维拉）等人，临时搭班合作演出黄宗江编写的《甜姐儿》、《魂归离恨天》两剧。这是我在上海“苦干”剧团期间，为找党、找关系去“苏北”，屡次受挫，因而决计北上，意欲通过北京地下“民先”战友的老关系，直奔陕北延安过程中一次短暂的穿插行动。

我们预计在天津演出时间不长。正当第二出戏刚刚搬上舞台时，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投降了！这个消息使我们一直做着“持久战”思想准备的人，不能不感到突然和意外。

我们有几个在天津没有住处，按照演出合同，可以享受几天天津饭店客房待遇的演员，于8月14日那天，亲眼见到长年占用饭店楼上高级客房的日本军官，平日骄横拔扈、不可一世，转眼间，忽然变得失魂落魄，愁闷不堪。开始，我们有点

纳闷儿。后来，从饭店职工嘴里听说：日本军官齐集饭店大厅，跪在收音机前，俯头躬身聆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的狼狈情景。我们高兴得跳起来。

一阵阵按捺不住的内心激情，促使我们纷纷跑出饭店大门，走上街头。这时“日本鬼子投降”的喜讯，已如春雷一般到处滚动起来。不少市民群众从各自不同的渠道，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人脸上绽开了笑容。剧团立即宣布辍演，准备迎接新形势的到来。

然而，大家迎来的不是严冬已去，万物复苏的美好春天，按节气说不是，按政治气候条件来讲也不是。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像天津发大水。大旱逢雨本是好事，可偏偏又遇到了洪涝灾害，河水猛涨，许多污泥、浊水夹杂着腐烂垃圾，从阴沟里又汨汨地冒出来，注满市区。人们张大眼睛，吃惊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是真的。但是日本侵华驻军并未放下武器；反而加固市区防御工事，抗拒远近郊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中国八路军、游击队的受降要求。许多以当地纯朴农民为主力，在多年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抗日人民武装，意欲进军市区，迫使敌人放下武器，及早结束市民群众的奴隶地位，结果遭到敌人猛烈的抵抗。许多英勇无畏的抗日战士，在胜利在握的时刻，却纷纷倒在敌人凭借强固工事喷射出来的火舌跟前，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次日，敌人通过他们依然在握的宣传工具，大肆散布谎言。他们胡说：昨日，郊区窜来一股“土匪”，妄图闯入市区进行抢掠。大日本皇军为确保社会治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不得已予以还击……（记忆中的大意）

八路军盛怒之下，一举攻克杨村火车站，与日本天津驻军

展开了殊死的血战。枪声、炮声时紧时松，时远时近，持续不断。依然控制着天津市区的敌伪当局宣布戒严，实行宵禁。

我们几位住在天津饭店的演员，由于剧团辍演，合同失效，必须立刻从饭店搬出来。我想回北京，车不通了。我需要临时找个栖身之地。宵禁时刻已到。急切中，经黄宗英介绍，我向剧院附近一位热爱话剧的青年朋友家求助，躲了一夜。

次晨，我来到市中心区金城银行，找一位在那里当行员的表外甥，承蒙他的协助，使我住进了银行大楼职员宿舍。白天，我时常到卫禹平家串门；晚上，和这位亲戚谈天说地。有时，我独自一人登上银行楼顶平台，远眺市区风光；俯瞰楼下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车辆。从表面上看，这一带闹区相当繁华，仿佛与战争年代“敌占区”的凄凉景色不大沾边。这里街衢纵横，商店林立，无论是帝国主义分别割据时期，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独霸年代，它都保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型发展的虚假繁荣表象。“七·七”芦沟桥炮声中，我从北京逃亡出来，即曾经路过这里，转乘英国海轮，远去华南要地，投入抗日救亡第一线。如今，我以“剧人”身份重返故地，亲眼见到了自命“武运长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遭惨败的命运。然而，敌人的失败并没有为我们迎来自由解放和幸福美满。展现在市民群众面前的依然是苦难、不安与捉摸不定的复杂局面。

一天清晨，我环视长空，极目远眺，不知不觉又陷入了沉思。

忽然，一阵阵闷耳的轰鸣声自远而近，直逼头顶。不少人闻声跑出室外。刹时间，各处楼顶、凉台、街头都挤满了人，直颈昂首，四方寻视，有人指点着高喊：“飞机！飞机！中国飞机！”有人纠正道：“美国飞机！那是美国飞机！”人们的呼唤声、喊叫声，伴随着机群低空飞掠的轰鸣声沸腾起来。